

民国大师文库

(第六辑)

中国教育史

(下)

陈青之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民国大师文库

(第六辑)

中国教育史

(下)

陈青之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第三十三章 中明教育家及其学说

第一节 概 论

明代开师门讲学的风气，始于正、嘉之际，成、弘以上虽有讲学，各皆谨守绳墨，未尝以此相号召。自正、嘉至于隆、万，百年之间，士论庞杂，学风大变，虽然良莠不齐，而明代学术界的光彩确在这一个时期足足放射出来。这一个时期，我们称之为中明。在中明时期，我们选择陈白沙、湛甘泉、王阳明、罗整庵、吕泾野五人，及王门弟子数人。除王门弟子外，此五人中，约分着三派：（1）白沙与甘泉为一派，（2）阳明为一派，（3）整庵与泾野又为一派。此三派中，以阳明学派的势力最大，所揭“致良知”之旨，直捷简易，一扫宋儒以来程、朱之繁重，使社会耳目一新，于是风靡了全社会，而全社会读书分子差不多被此说所鼓动。第一派议论在朱、王之间，势力也非同小可，而王学之产生，亦由第一派有以开其先河。以上两派，皆是朱学末流的一种反动。但在王、湛两家风靡天下之际，居然有罗、吕二氏出来拥护程、朱，与炙手可热的敌党抗争，可谓疾风中的劲草；不过他们所讲的已非程、朱之旧了。在这五人中，除白沙外，对于心性二字皆有论列；阳明谓心即理，整庵与泾野均谓性即理，甘泉则谓心性同为一体——阳明与甘泉属于唯心论者，整庵与泾野属于唯性论者。在修养方面，白沙主静，要从静中养出个端倪来；甘泉以敬为

主，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工夫；阳明则主省察克治。在教育理论方面，只有阳明与泾野二人注意过，所论也极有价值。阳明以“致良知”三字为教育主义，以知行合一为学习工夫；儿童教育尤在于培养其活泼的天性，养成爱动爱唱爱游戏生气盎然的儿童——此种种议论，从前教育家很少说过，与朱子的训练主义更不可以比拟。泾野关于教育理论有两点：学习重下学工夫，教授主个性发展——他最喜孔子的教法，也是朱子的呆板方式。至于王门弟子，人数虽多，喜言本体，略却工夫，对于教育方面绝少贡献。但在教育生活方面，此数人者皆不愧为一代的教育家，各人有各人的精神。

第二节 陈白沙(1427—1500)

一 生活小史

吾人叙述明代教育家已四人了，他们都是笃信程、朱，谨守绳墨，愈讲愈陈腐，内中看不出一点生气来。能在思想上表现一点生气，表现一点自我精神的，则要始于陈白沙。陈氏是儒家的精神，是禅门的工夫，是老、庄的态度，是集合各家的学说而形成他自己的人格的一个。他的思想极其圆通与高明，不是一孔之儒所能比拟，胡氏疑他误入于禅，刘戡山说他作弄精魂，皆属己见，而白沙不能承认的。白沙在儒家中，似周濂溪与陆子静之间的人物，天资聪慧异常，用过苦工，经过训练几二十年，所以卒能求得一贯之理，既非空疏，又不支离，当然非薛、胡诸人所能及了，但白沙所以形成这样一个伟大人物，于他所处的环境不无关系。

陈氏是广东新会人，名献章，字公甫，所居白沙里，故世称白沙先生。白沙距海不远，在海岸所生长的人才，天资思想较在内陆当有不同。

陈氏生于宣宗宣德二年，是一个平民家庭。在他出世的前一个月，他的父亲已死去了，他的母亲抗节鞠养，所以他后来对于母亲极尽孝诚，终身不肯留京做官，一方由于性情恬淡，一方为不忍远离他的母亲。他以英宗正统十二年举广东乡试，第二年赴京会试，结果不佳。过了数年，离京南下，往崇仁从学于吴康斋。从康斋时，陈氏年已二十七岁。康斋乃程、朱学派，性情最严毅清苦，白沙与他不合，所以不到一年，他就告辞老师回到他的故里了。回家以后，筑阳春台为书室，攻苦研究，费尽十余年的工夫，前数年谨守旧法，毫无所得，其后乃自静中自求而得之。他的一生学问，也成功于此时自得上面。后来遭遇家难，于宪宗成化二年由家来京，复游太学。当此之时，陈氏年已四十，受入学试验，以诗和杨龟山的“此日不再得”为题，大为祭酒邢让所赏识，谓“真儒复出”，由是白沙之名震动京师，京师学子纷纷及门受教，而陈氏的教育生活从此开始了。不久南归故里，专门讲学，以他思想的精到及娓娓不倦的精神，感人最深，所以四方学者来学的日多。贺钦为给事中，乃辞官还家，奉白沙肖像于别室，朝夕瞻拜，其崇拜之深可想而知。陈氏活了七十三岁，死于孝宗弘治十三年。平生不肯著作，与象山相似。著名弟子有李承箕、张东所、驾钦、湛若水诸人。

二 学习论

白沙平生不肯著述，我们要研究他的思想，只有从他所与朋友的几封信札及几篇语录里面去寻。在这些上面，最关重要的有两点：一为原理论，即描写道之性质与作用；一为方法论，即说明求道的工夫。前者属于哲学范围，此时勿庸讨论；后者可以属于教育范围，正是我们所要叙述的。白沙关于教育方面的发表，也只有一种研究的方法——求道的工夫，我们名之曰学习论。“白沙之学，以虚为基本，以静为门户，以四方上

下、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，以日用常行分殊为功用，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之则，以未尝致力而应用不遗为实得。”（《白沙学案》）黄氏这一段话描写白沙研究的工夫可谓透彻，但还不如白沙自己所说的切实。在他答复赵提学的书信上有这一段话：

仆年二十七，始发愤从吴聘君学，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，盖无所不讲，然未知入处。比归白沙，杜门不出，专求所以用力之方，即无师友指引，惟靠书册寻之，忘寝忘食，如是者亦屡年，而卒未得焉。所谓未得，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。于是舍彼之繁，求吾之约，惟在静坐。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，常若有物，日用间种种应酬，随吾所欲，如马之御銜勒也。体认物理，稽诸圣训，各有头绪来历，如水之有源委也。于是焕然自信曰：作圣之功，其在兹乎？有学于仆者，辄教之静，盖以吾所经历粗有实效者告之，非务为高虚以误人也。”（《白沙文集》卷三）

由这一段话看来，白沙当初发愤为学，也是读书穷理，用过了下学的工夫。因为研究数年没有结果，乃改变方法，从静坐体认入手。静坐是收敛精神，统一意志，去掉一切胡思乱想的念虑，迨意志统一了，心地清明了，则头脑才可以冷静，成见才可以扫除，心中才无挂碍。然后以客观的态度，从日用常行中察见人情物理。必须从日用常行中察见人情物理，是一种体认的工夫。能够从此体认，则合于人情物理的即合乎天道，懂得人情物理的即懂得天道，于是学问庶有成就，而入圣之功亦不远了。但这种体认的工夫，殊非易事，但亦不能看得太难了，只在日用间随时体认，自然有得，着意理会反不成功。这种工夫不能把捉太紧，但亦不能过于散漫，只要勿助勿忘，久之自然有得。这种工夫，不能由书本内寻求，亦不

可以言语传授，只在学者各人深思而自得。在体认的过程中，必有几次怀疑的时期，——近代所谓学习高原期。有了高原期就是进步的征兆，陈氏也承认，且极赞许。他说：“前辈谓学贵知疑，小疑则小进，大疑则大进。疑者觉悟之机也，一番觉悟，一番长进，更无别法也。即此便是科级，学者须循次而进，渐到至处耳。”（《与张廷实书》）

由这样看来，白沙求学的工夫，第一步须静坐，要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。端倪养出来了，才可以商量第二步的工夫。^①这是从周濂溪“主静以立人极”而来的。^②这里所谓端倪，即他在别处所说的“大本”或“大总脑”。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，即抓住了为人的大本，学问的大总脑。他说：“学问大总脑要见，见则便自快活，更肯向前，下面节节推去，无非一个道理。”（《语录》）是要有大总脑的。又说：“文章、功业、气节果自吾涵养中来，三者皆实学也。惟大本不立。徒以三者自名，所务者小，所丧者大，虽有闻于世，亦其才之过人耳，其志不足称也。学者能辨乎此，使心常在内，到见理明后自然成就得大。”（《书漫笔后》）是要立大本的。这种论调，与象山所提倡孟子“先立乎其大者”的一句话相同；至于由静坐入手，则又是兼采宋儒诸家的下手工夫；所以说白沙是融和诸家的一位“极高明”的学者。但他虽然教学者从静坐入手，却不是静的教育家，他是极尽活泼与自然的一位教育家。

第三节 湛甘泉(1466—1560)

一 生活小史

湛氏名若水字元明，是广东增城的人，学者称为甘泉先生。生于宪宗成化二年，死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，先阳明六年而生，后阳明三十二年而

死，完全与阳明同时，而享寿可大他三十八岁，仅差五年到一百岁。自二十七岁，中了广东弘治五年的乡试之后，即拜白沙为老师，研究心性之学，不愿作政治生活。迨后以母命勉游南京，入国子监读书，随同会试，中了弘治十八年的进士及第第二名，而先生年已四十岁。这个时候，阳明在吏部讲学，先生与吕泾野等学者互相倡和，在先生与阳明个人的讲学生活始于此时，而明代讲学之盛、门户之分也从此大开风气。迨后奉命出使安南，不久以母丧归葬，在南方住了七八年。世宗即位，宣他进京，派为侍讲，第二年升南京国子祭酒，正式担任国家教育。湛氏本无心于政治，但他的官运却也很好，后来历任在南京吏、礼、兵三部尚书，到七十岁时才以老故谢绝政治生涯。总计湛氏自四十岁以后，五十五年间，无日不讲学，无日不授徒，不愧为“志笃而力勤”的一位教育家。我们要把他的教育生活分着数段时，当四十岁以后为第一期，在北京讲学；当五十岁以后为第二期，在家乡讲学；当六十岁以后为第三期，在南京讲学。自七十岁以后二十五年间，谢了政治生活，专门从事于私人教育；他于是周游各郡，讲学变成流动式的，因之他的及门弟子亦遍天下。湛氏为白沙的高足弟子，足迹所到，必建书院纪念白沙，对于其老师可算崇拜尽致了。他的讲学方法，颇有特别。当他在乡居丧时，筑西樵为讲舍，凡生徒来斋从学时，先令习礼，过了三天然后允许听讲。当开讲之初，还须澄心静坐片刻，把精神收敛，把注意集中，才开口讲书，这与昔日陆子在象山讲学时方法略同。湛氏与阳明交情颇深，自在北京订交后，虽彼此以讲学相倡和，而两家宗旨各异——阳明以致良知为主，甘泉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，所以当时学风分王、湛二派，虽湛门之盛不及王门，亦犹昔日陆之与朱了。

二 心性说

甘泉在南京讲学时，作了一幅《心性图说》，一方面说明心之本体，

一方面也含了驳倒阳明论心的意思。他说：“盖阳明与吾看心不同：吾之所谓心者，体万物而不遗者也，故无内外。阳明之所谓心者，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，故以吾之说为外。”（《答杨少默书》）“体万物而不遗”一句话，即甘泉说明心体的一句总语。吾心不仅在腔子内，也不是在腔子外，它是与天地万物一体的。宇宙只是浑然一气充塞流行，这种一气之浑然，就是心，没有内外，没有终始。这个心体，“洞然而虚，昭然而灵”，内中没有一物，而不遗一物，所以与天地万物同体。这个心体是具有生理的，生生不息的，此中生理谓之性，其实心性只是一物；故曰“性也者心之生理也，心性非二也”。（《心性图说》）譬如谷种，其体谓之心，其所具生意谓之性。这种生意发表出来谓之情，发出而得其正，则有恻隐、辞让、羞恶、是非种种情绪，这几种情绪就是仁、义、礼、智诸德目之造端。由这看来，心即自然之浑体，藏着无限的生意，生生不息，流行不已，就谓之性；心与性实一物，故心性皆是至充至沛、至明至善的。但吾人后来为物欲所蔽，有时遂“窒然而塞，愤然而昏”了。虽然昏塞，而本体之虚灵固无不在，要回复本体，不假外求，只要吾人一朝觉悟，把物欲灭去，而本体之虚灵自见，此甘泉所论心性的大意。

三 修为论

湛氏平生讲学揭出“随处体认天理”之旨，他的修为主义亦可以“随处体认天理而涵养之”一句话包括。什么叫天理？他说：“人心一念萌动即是初心，无有不善。如孟子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便有怵惕恻隐之心，怎见处亦是初心复时也。……若识得此一点初心真心便是天理，由此平平坦坦持养将去可也。”（《语录》）又说：“古今宇宙只是一理，生生不息，故曰动静无端，阴阳无始，见之者谓之见道。”（同上）我们由以上两段话，再参以他的其他语录，代为解释如下：吾人本心之所以充满善机，无

限仁义，以有生之理在；此生生之理即是天理。具于吾心谓之初心，充乎天地谓之元气，而它是无时或息无往不在的；所以他又说“若见得天理，则耕田凿井，百官万物，金革百万之众，也只是自然天理流行”（《语录》）。宇宙只是天理一气之流行，草木所以能遂其生，就是涵有此天理；吾人所以求为圣贤亦在乎涵养此天理之正，但平日往往为私欲所蒙蔽，所以应当体认出来。体认的工夫要使吾人对于天理默识心通，使此心与所感触之事物，契合为一，就是天理流行。这种工夫，虽不难，亦不易；要勿忘，亦勿助，顺其自然之势而体认之。体认天理，要使心中无一事，而天理自见，不是着意想象的，想象则陷入于安排了。体认天理，不是静的工夫，空守其心，它是合动静的。体认天理不仅认识天理而已，还要能够实行，它是兼知行的。但天理是整个流行的，无微不至的，凡一草一木，莫不有天理的存在；一语一默，莫不有天理的功用，所以要“随处体认”。他说：“自意心身至家国天下，无非随处体认天理。”（《语录》）“自一念之微，至事为之著，无非用力处也。”（《语录》）“所谓随处体认天理者，随已发未发，随动随静，皆吾心之本体，盖动静体用一原故也。”（《语录》）此即随处体认天理之意，随时随处把天理体认出来了，再加以涵养的工夫，则心广体大，修养纯全，才是圣学，才可以学为圣贤。

湛氏即揭出“体认天理”一语为求学的要旨，他的门人又给他定出三个步骤——立志、煎销习心、体认天理。但他以为这只是一事。他说：“此只是一事。天理是一大头脑，千圣千贤共此头脑，终身只是此一大事，更无别事。立志者，立乎此而已；体认是工夫以求得乎此者；煎销习心以去其害此者，心只是一个。……志如草木之根，具生意也；体认天理如培灌此根，煎销习心如去草以护此根，贯通只是一事。”

湛、王两家皆讲格物，但湛氏谓王氏训“格物为正念头”之意，容易陷入空虚，表示反对。他自己训“格物为体认天理”，体认兼知行，所以

必须学问思辨行之功，从学问思辨行中随处体认，较从正念头切实多了。湛氏不仅“格物”二字当作体认天理解释，连“慎独”二字也当着体认天理解释，甚至一切工夫，皆以体认天理四字来解释，这种绝对的一元论，只有唯心的学者才说得出来。孙夏峰评论他“所论以自然为本体，以勿忘勿助为工夫，大抵得之师门为多”（《理学宗传·湛甘泉》），自是正论。但湛氏最反对静的工夫，他说：

古之论学未有以静为言者，以静为言者皆禅也。故孔门之教皆从事上求仁，动静着力。何者？静不可以致力，才致力即已非静矣。故《论语》曰：执事敬；《易》曰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；《中庸》戒慎恐惧慎独，皆动以致其力之方也。何者？静不可见，苟求静焉，赅赅乎入于荒忽寂灭之中矣。故善学者必令动静一于敬，敬立而动静浑矣，此合内外之道也。（《答余督学书》）

白沙论修养以静为要，甘泉则以敬为主，谓敬可以包动静，单主静不仅支离，亦且不通——这是师弟不同的一点。

第四节 王阳明(1472—1528)

一 生活小史

自朱子死后二百七十二年，中国又出了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曰王阳明。王子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，卒于世宗嘉靖七年，是明朝中叶的人物，是十五、十六两世纪之间的人物。他的学问，近则渊源于周、程，远则脱胎于孟轲。他的思想略近于象山，但其伟大精深的成就则非象山所能企及。他

平生很佩服晦翁的精神，但二人却有显然的差异：晦翁是重经验的，阳明则重直观的；晦翁是二元论者，阳明则为一元论者；晦翁所采的归纳法，阳明所用的演绎法。但论到研究的精深，门徒的众多，及影响思想界的远大，阳明可谓晦翁以后第一人。晦翁一生著作宏富，阳明不肯著作与象山同；但以学者而兼军事家，在军事方面能奏奇绩，树立伟大的勋业，则又非朱、陆二人所能及了。但阳明在明朝虽建树了非常的伟业，开辟了崭新的学说，在当时只落得谤毁满身，以伪学相目的结果，与程、朱暮年同一惨淡，道高毁来，不禁古今有同慨！

王子名守仁，字伯安，阳明是学者对他所称的外号。他生于浙江余姚，在当时算得一个很名贵的家庭。他的曾祖父槐里公以明经贡入太学；祖父竹轩公以处士封翰林修撰，在学术方面颇有著作。他的父亲龙山公以成化辛丑年的进士及第第一名，屡为侍讲，做官至南京吏部尚书。史称龙山公“气质醇厚，平生无矫言饰行，仁恕坦直，不立边幅，与人无众寡大小，待之如一”（《海日先生行状》）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一个很有修养的道德君子，宽宏大量的上品公卿。王子生长在这种名贵的家庭，勿论先天的遗传，或后天的环境，都较一般儿童格外优厚，成就的机会自然较多。他的思想特殊，一生奇迹非常之多；生到六岁时，才能言语，如果他真正走入宗教界，一定会成一个圣者，是可以想象的。在他一生之中，思想屡变，行为亦屡变。当少年时代，气概不凡，有吞牛之志，很想做一个义侠，或做一个军事家。他之走入儒家里面，研究宋儒学说，实在结婚之后。平生没有一定的师傅，在十八岁时，从洪都婚后回浙，经过广信，由娄一斋的启示，知圣人可学而至，才有志于圣贤之学。阳明后来的成就，虽在当时非任何人所能范围，但一斋为吴聘君的高足弟子，思想学说近于陆象山，阳明的思想，受了他的暗示，是无可疑的。不过此时他的意志犹未安定，为学亦没有得到切实的门径，所以出入辞章、佛老，反复数次，一直到三十四岁，与湛甘泉定交于京师，对于儒家学术始有坚决的信仰，

立志做圣贤的工夫了。^③

当这个时候，武宗昏聩，国家政权，为宦官刘瑾所把持，王子以进士出身为兵部主事，因仗义执言，触犯了刘瑾，遂被贬谪到贵州的龙场驿当驿丞。龙场在万山丛棘中，苗瑶杂处，瘴疠蛊毒交侵，为人情所不能堪。阳明以士大夫之身，被窜到此，就是宦官想给他一条死路罢了。此时王子已三十七岁。在是年以前，他还是谨守朱子的循序格物之说。这个刺激，这种环境，也许时势有意造英雄，在困衡动忍之际，九死一生之中，因以大彻大悟，创造一种新的学说出来。这种新的学说即历史上有名的“良知说”，而王子以后遂成就第一个极端的唯心论者——唯心的一元论者。王子初抵龙场，为武宗正德三年春季，约计住了二年，于四年末了才离开此地，五年三月到庐陵知县任所。在庐陵仅治七个月，成绩卓著。于是年十二月又升为南京刑部主事，时年三十九岁。自此以后，官运渐佳，屡次升调，时而南京，时而北京。到四十五岁，派出为地方封疆大吏——巡抚南赣汀、漳等处，他的丰功伟绩与他的良知论从此一日煊赫一日，而他之受毁受谤、遭怨遭忧的事情也就不能使他一日安居了。由正德十二年正月前赴任所，转徙征调，合计在江西过了五年的生活。在五年之内，剿灭山洞诸贼，讨平宸濠叛藩，功业过于煊赫，为小人所妒忌，几遭陷害。

此时王子急想勇退，屡次请求回籍省亲，借得休养，到正德十六年九月始被批准。过了不久，昏聩的君王死了，继位者为世宗皇帝，比较武宗稍觉贤明，而王子业已年逾五十，成了一副衰老的身体，可是他的学问之大成及他的及门弟子之极盛，却在此时期以后。在越共计讲学六年，到五十六岁时，病体日衰，而政府偏要他带兵去征思田，不能使他安享暮年，我想是时王子的心理是很苦的。嘉靖六年九月，王子由越中出发的前夕，且与他的高足弟子证道于天泉桥上，作为临别的赠言。是年十一月到梧州，第二年二月就平定了思田。当时大病日剧，王子一面呈请告老，一面扶病北旋，行到南安，不能久留，这位教育界的明星，思想界的泰斗，乃

与此世长辞了。灵柩运回原籍时，所经过的地方，士民老少莫不遮道痛哭；会葬之时，门人自远方而来的一千余人，足以想见其教育成人之深。政府方面因此对他更加妒忌，说他所讲的尽是伪学，且下诏禁止，这又与朱子当年的景况有不期然而自同了。王子享年五十七岁，平日著作不多，后世收集的《王文成公全书》三十八卷，以论学理论为多，其中以传习录为其思想的结晶。

二 教育生活

王子自三十四岁讲学起，到老死为止，合计讲学了二十三年，但纯粹讲学时期只有从五十岁以后回乡的六年。除了六年的纯粹讲学时期，其余十七年全是从事于政治生活，于从政之余随时讲论，所以弟子亦随着老师周游以问道。王子在这十七年中，或窜夷荒，或任小官，或迁调两京，总领师干，勿论清闲与繁忙，不问忧患与安乐，而讲学的工作未尝一日停止。因为他的讲学生活是整个的，不是分裂的，我们要分做几个段落，只有按照他的思想之变迁为标准。王子是一个思想最敏锐不肯安于陈说的教育家，所以在求学时代思想凡三变，在讲学时代思想也是三变；不过每变更一次，他的思想更深进一层。我们且举他的讲学三变：（1）自龙场至滁州一变，为第一期；（2）自南京至江西又一变，为第二期；（3）自讨平宸濠至退居越中又一变，为第三期。第一期由三十七岁到四十二岁，共计五年。在此时期，发明了良知之旨，力讲知行合一之说。且体段较高，以默坐澄心为学的，排去一切枝叶，使学者自悟性体。第二期由四十三岁到四十九岁，共计七年。在此期中，深悔从前过高之失，力矫从前空虚之弊，所以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——格物致知之功。第三期由五十岁到五十七岁，共计八年，专倡“致良知”之说，盖自平宸濠以后，所受激刺过多，王子一本天理良心勇往直前，不顾毁誉利害，卒能战

胜难关，他以为这由于推行良知的效能，所以教人为学之方又一变了——这一变也可说成了他的晚年定论。^①王子当五十岁时，才揭出致良知三字，较从前格物致知更其简易。自此省亲回乡，年事已高，造诣日精，且因在野较闲，所以游学之士四方咸集，凡余姚附近寺庙皆是王门弟子的卧铺，环坐听讲的常三百余人，一时之盛，真可与昔年考亭比隆。

王子性情极潇洒，颇有濂溪的态度，曾点的风味。常借山水名胜之区，作他的讲习之会。这种情况，在他共有两次；一在滁州，一在会稽。我们把阳明年谱里头的两段话抄来，也足以令千载下的人们景慕不置。“滁州山水佳胜，先生督马焉政，地僻官闲，日与门人遨游琅琊襄泉间，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，歌声振山谷，诸生随地请正，踊跃歌舞，旧学之士皆日来臻，于是从游之众自滁始”，这是在滁州讲学的一段佳话。“中秋月明如画，先生命侍者设酒碧霞池上，门人在侍者百余人。酒半酣，歌声渐动，久之，或设壶聚算，或击鼓，或泛舟。先生见诸生兴剧，退而作诗，有‘铿然舍瑟春风里，点也虽狂得我情’之句。”这是在会稽天泉桥上的一段佳话。而天泉桥尤为阳明学说的一大纪念地，盖先生于出征思田的前夕，率钱、王二弟子证道的地方，所谓有名的天泉证道问答。在这晚上，王子自知病体已重，恐怕一去不返，很高兴地给他们以自己平生学问的结晶，所以说这一次可为王子的临别赠言，亦可为他的临终遗嘱。

三 心即理说

从前陆子“心即理也”一句口号，自然要被绝对的唯心论者王子所采用；王子不仅采用这一句口号，并且把他的意义更扩大了。他说：“夫物理不外于吾心，外吾心而求物理，无物理矣。遗物理而求吾心，吾心又何物耶？心之体性也，性即理也。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亲之理，无孝亲之心

即无孝亲之理矣。有忠君之心即有忠君之理，无忠君之心即无忠君之理矣。理岂外于吾心耶。”（《答顾东桥书》）这是解释“心即理”一个名词的。凡万物之理皆包含于吾心之中，吾心之中即具有万物之理；外了吾心即无物理，舍了物理亦不成其为心了，所以说心与理是一件东西。不懂心与理是一件东西，凡天地万物与心皆是一件东西。他说：“夫在物为理，处物为义，在性为善，因所指而异其名，实皆吾之心也。心外无物，心外无事，心外无理，心外无义，心外无善。”（《与王纯甫书》）这一段话，说得更扩大，更简当。一切东西皆是心境，皆是心之幻象，可以说“心在则有天地万物，心灭天地万物也灭了”。

王子于陆子“心即理”之外，又援用孟子的“良知”说，自己引申一句口号——“良知即天理”。即谓心即理，又说良知即天理，则“心即良知”了。心既是良知，则心无不善，而心性为一，故性无不善；于是心、性、理、良知等名词皆成了一件东西，不过所说不同，故命名各异。如果要分别这些名词，还是引王子自己的话来解释。他说：

性一而已；自其形体也谓之天，主宰也谓之帝，流行也谓之命，赋于人也谓之性，主于身也谓之心。（《答学生陆澄》）

知是理之灵处，就其主宰说便谓之心，就其禀赋说便谓之性。（《答学生惟乾》）

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，故良知即是天理。（《答学生欧阳崇一》）

就以上三段，我们总结起来：心是一种浑体，廓然大公、寂然不动的浑体。但是极其灵觉，一感便通；极其昭明，无物不照；极其广大，无远不届。就此浑体之本身说谓之性；就其能够作吾人的精神主宰说谓之心；就其昭明灵觉处说谓之知；就其纯粹至善说谓之良知；就其动静咸宜、自

然恰当之点说，谓之天理——其实只是一个心。

大学上所载“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诚意”几个字，王子与朱子所解释亦不尽同。朱子以前两种属于外感方面，后两种属于内心方面；王子则把它们全属于内心方面来说。他答程朱学派罗整庵的书上说：

理一而已：以其理之凝聚而言，则谓之性；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，则谓之心；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，则谓之意；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，则谓之知；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，则谓之物。（《文集》卷三）

答他的学生徐爱说：

身之主宰便是心，心之所发便是意，意之本体便是知，意之所在便是物。（《传习录》中）

把“心、意、知、物”全属于内心方面，当着精神作用，自宋、元以来只有王子这样讲过，到后来刘蕺山更说得微妙了。总之，吾人的精神作用，以心这主宰，心即天理之本体；这个本体只要不为私欲所蒙蔽，由它所发出来的无不恰当，无不合于天理。我们要求事事物物皆合于天理，也只有在吾人本心上求，这个本心如同规矩尺度，一切皆以它为准，应用没有穷尽。^⑤良知既为一切的准则，应用无穷；所以发而为事父则为孝，发而为事君则为忠，发而为万事则无往而不当。

四 致良知主义的教育论

王子讲学第一期多讲格物、致知，第二期多讲省察、克治的实功，第